



上海 金融改革 往事

龚浩成 口述 陈岱松等 整理

中西書局



上海金融改革往事

常州人藏书章

莫浩成 王述 陈岱松等 整理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金融改革往事 / 龚浩成口述;陈岱松等整理.
—上海: 中西书局, 2013. 2
ISBN 978-7-5475-0483-3

I. ①上… II. ①龚…②陈… III. ①金融改革-经
济史-上海市-现代 IV. ①F83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6633 号

上海金融改革往事

龚浩成 口述 陈岱松等 整理

责任编辑 毕晓燕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483-3/F·004

定 价 38.00 元

口 述 龚浩成

策 划 范永进

主 编 陈岱松

编 委 范永进 陈岱松 沈惠民 李济生

整 理 陈岱松 罗羽琪 魏华文 荣 华

审 稿 王国平 刘小坤 丁沪生 钟家龙

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一系列金融改革在上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引领了全国的金融改革步伐。1987 年 4 月,交通银行作为全国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上海开业,打破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专业银行的垄断局面,标志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开始逐步发展。同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决定建设上海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此后十年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借额累计达到约三万亿元,且未产生坏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上海还开始酝酿并陆续引进了美洲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等外资银行以及友邦保险、美亚保险等外资保险公司,开启了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而 1990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更是标志着改革开放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无不显示出上海金融改革的开拓性与前瞻性。在这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中,就包括了本书的口述者——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

龚浩成,192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如今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前,龚浩成就读于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银行系,全面地学习了经济学领域的知识。新中国成立后,龚浩成的多数时间是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直到1984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由一名学者转变为一名学者型官员。1987年,龚浩成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任职期间,龚浩成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亲身参与了交通银行的组建工作,并推动建立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上海外汇调剂中心。1989年,龚浩成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并直接向朱镕基同志汇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他还担任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主持工作。可以说,龚浩成是当年上海金融改革许多重要事件的权威见证者与参与者,是回顾上海金融改革的“活字典”。

本书根据龚浩成老人的口述整理而成,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往事做了全面而细致的回顾。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分别回顾了上海银行业改革、资本市场的建立尤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上海的金融对外开放以及金融服务环境的建设,并收录了龚浩成在不同时期对上海金融改革的回顾、思考与展望,从上海金融改革亲历者的角度为读者呈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上海金融改革往事,同时也是对这一段珍贵历史资料的精心留存。



龚浩成 口述

绪论 我的人生经历与上海金融改革

从求学经历说起

我于1927年2月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农村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武进是典型的鱼米之乡，老百姓生活比较富裕，即使是在解放前，吃不饱的情况也很少。我先在农村读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前往上海读书。1941年底，以珍珠港事件为标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又从上海回到了武进，继续在农村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上了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现为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中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校，除一座教学楼和科学馆外，校产荡然无存。至于其前身府学堂时的旧物，仅存一碑一塔一树而已。在当时，常州中学、苏州中学和扬州中学是江苏最好的三所中学。

从常州中学毕业后，我于1947年考进了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银行系，国立上海商学院就是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学校第一任教务主任马寅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是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思想比

较超前,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就提出要控制人口,虽然遭到批判,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50 年,国立上海商学院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第一任院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国立上海商学院学到了比较全面的经济学领域的知识。1947 年,我读大学一年级时学习经济学,当时的老师是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炳欢。那时学的是地道的西方经济学,现在我只对三个人的理论印象深刻。一个是亚当·斯密,他是现代经济学的老祖宗,他的理论属于古典经济学,包含了朴素的劳动价值论。另一个是凯恩斯。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比起 1929 年至 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来说,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据李炳欢老师讲,那时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牛奶没有人买,只能倒到河里。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凯恩斯提出,要挽救危机,就需要国家出钱。虽然国家没有钱,但国家可以印钞票。凯恩斯还指出,剩余劳动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他许多种类的工程。因此,可以由国家雇用失业的工人挖沟渠,给他们发工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样是不创造价值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也是不创造价值的,因为不生产产品。但是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这批失业工人有工作了,领了工资,就会去买东西,有效需求也就增加了,企业就会恢复生产,这样过一段时间就必然会把生产都带动起来。这就是凯恩斯的理论,政府须要干预经济,单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不行的。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流行,这一理论提出完全让市场做主,让这只“看不见的手”去发挥它的作用,我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始终认为经济是须要政府干预的。

第三个就是马克思,当时课堂上老师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那时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还不深入,可是总感到马克思说得有道理。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当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总是很困难,而根据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是这些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当时在学校里,各种观点都会讲到,这对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好处。到了大学三年级,学校开设了高等经济学,学生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学派,有的人选亚当·斯密,有的人选凯恩斯或者马克思。我选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门课,叫帝国主义论,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时学生连书本都没有,只有老师才有。老师讲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等内容,这门课打开了我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窗口。总之,我的一个体会就是,学校多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学生的知识就会比较全面。

1951年,我本科毕业后留校教书。1952年到1955年期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读研究生,那个时候完全是“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理论。这三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剩余价值学说掌握得比较清楚。当然,剩余价值理论在现代社会的运用,还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有人说根据剩余价值理论,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难道科学技术就不创造价值了吗?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或者说管理就不创造价值了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些都是必要劳动,但并没有明确说它们也创造价值。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科学技术、管理劳动,这些都是直接创造价值的。

从工作经历说起

1955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担任助教、讲师,讲货币流通与信用。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在这一时期开始了: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三面红旗”(指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60年5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5月以后又被称为“三面红旗”),1961年和1962年的整顿人民公社,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还没结束,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所以我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

在当时的社会运动过程中,我有很长的时间待在农村。我曾在宝山县葑溪公社一个大队里当了一年实职党支部书记,要负责安排工作。这是一个棉粮蔬菜夹种的大队,这个茬口种什么,下一茬口种什么,我都学过。因为当过一年安排生产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所以“文革”期间劳动,我就管蔬菜。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早上要跳“忠字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唱歌和跳舞,正好我是分管蔬菜的,而蔬菜每天早上要浇水,特别是夏天,所以每天早上别人去跳“忠字舞”,我就带上五六个人挑上担子去浇水。

还有一段时期是要调查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公共食堂究竟好不好。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几个组到各省去调查、了解情况,要摸到真实情况。那个时候要摸到真实情况也真是不容易,我被派到江苏组,情况稍微好些。安徽组的人员,下去就很困难,华东局派出的调查组就五六个人,每个人配一个随行人员,名义上是



龚浩成

陪着你，实际上是不让你自由活动。那时生活真的是相当困难，大家都吃不饱。我记得自己在一个大队蹲点，一个月大概只吃了3斤大米。当时国家干部的定量不少，有29斤。但即使交了粮票，食堂也没有米饭，只有用草头和做肥料的红花草做的稀饭。当时我是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老乡看到我实在没有东西吃，他也很难过。有一天，他去钓鱼，钓到两条塘鲤鱼，他拿一个鸡蛋蒸了两条鱼，把塘鲤鱼蒸鸡蛋作为一道菜给我吃，那顿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年代还有一顿饭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是在金山县廊下公社，住在一个房东家里。我们就住在猪圈旁边，有时猪尿还会流到房间里，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的恶劣环境。有一年过年我回家了，过年之后半个月才回到房东那。回到他家里，他端上来一碗菜——萝卜烧肉，是过年的时候帮我留的，他们每次烧饭都蒸一蒸，蒸到我回来的时候，碗里的萝卜和肉已经看不到了，只有一碗汤了，但是那时候老百姓对我们干部是真心诚意的。

1969年我去了黑龙江省，在黑龙江边上的一个公社里待了6年多。在那里我们没有米饭吃，只能吃馒头，南方人长期吃馒头很难受，只有到县委去开会才能吃到米饭，过年才吃一顿饺子。我那时四十多岁，一顿能吃一斤米饭，因为一年都难得吃到。现在想想，这些事情经历一下对人生也有好处。我特别欣赏那些插队落户、后来又上大学的知识青年，他们信念坚定，事业能力强，能吃苦耐劳，特别是深谙下情，了解民众疾苦，社会阅历丰富。后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中的不少行政干部，都是从他们中选拔出来的。

1976年初，我从黑龙江省呼玛县回到上海，又被分配到海滨的市五七干校当理论教员，组织关系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这年10月,国家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又被借调到上海《文汇报》当编辑,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写大批判的文章。大约一个月写一篇,共写了十多篇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四人帮”要重建一个什么党?》,《人民日报》、中央电台都转载、转播了。

1978年下半年,上海财经学院恢复招生,我又回到上海财经学院,重新回到了教师的岗位上。

我在上海财经学院教书时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讲最新鲜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教货币银行学,中央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后来的市场经济问题,我想搞市场经济,金融市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金融市场中,资本市场是绕不开的问题,因此我用半天时间,介绍资本市场的理论和现状。当时学生反映很好,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股票买卖还可以做空、做多等。但事后,有些同志为我担心,建议我还是按教学大纲的要求,暂时不讲资本市场。那时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金融改革说起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去。在考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班子配备时,总行领导提出一定要配备一名理论界的同志,于是我就被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副行长,算是走上了仕途,但是没有完全脱离教学,还带着研究生。后来,交通银行成立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行长李祥瑞被任命为交通银行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我就接任了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市分行的行长职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确定朝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转了。这犹如一声春雷,引发了上海金融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幸见证了上海金融业的变迁,更有幸参与、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改革,我认为上海金融业改革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平行开展的。

第一,银行体系的变革。改变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建立起“以中央银行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银行体系”。最初,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中独立出来。1984年初,原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城市中的商业银行业务被剥离出来,成立了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那么,地方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当如何组建呢?当时上海就决定采取删繁就简的做法,在征得总行同意后,市分行不设分支机构,市区的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划归工商银行,郊县的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全部划归农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保留市分行本身,但必须完成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金融机构间的政策协调,以及机构审批、调查统计、外汇管理、国库收支、现金收拨(将现金调拨到南方各省区)的职能,这样的机构设置,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是绝无仅有的。

与此同时,新银行的组建工作也逐步展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1986年恢复全国性的交通银行和成立上海市区的城市信用社。交通银行的复业,标志着终于有了总部设在上海的银行。交通银行在解放前就有了,且为国家银行,解放后虽然停止了营业、关闭了营业机构,但是并没有撤销,交通银行的招牌、营业执照等都保存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仓库里。所以交通银行从筹备到开业,不应称之为重新建立一个银行,而应称之为恢复交通银行在大陆

的业务。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名称问题。起初,虽然打算叫交通银行,可是又考虑到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开设有交通银行,会不会引起纠纷?所以我们专门去香港,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请教,请他帮我们判断一下。他说,就叫交通银行,不要怕港台地区有想法,假如台湾方面有意见就迫使他们来找我们商量,如果他们没有反应就算了。就这样,交通银行的名称确定了下来。可以说,李储文同志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交通银行复业后,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就被调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工、农、中、建”诸行,它实行的是股份制,先天具有某种优势,上马没几年,两项举措就开创了全国之先例。其一,为了调动各省筹建交通银行的积极性,实行了总、分行两级法人制,各省的分行就迅速建立起来。但运作中,两级法人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相互牵扯,决策不能及时有效地贯彻。于是通过合情合理的工作,交通银行后来即变两级法人为一级法人。其二,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当时所有银行实行的都是指标管理,既严重束缚了各级银行自主经营的手脚,又与国际惯例不合。而交通银行在全国率先实行存贷差额管理。可以说,交通银行在诸多方面都体现了政府要将它办成“真正的银行”的决心。

关于城市信用社,我印象中,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的是辽宁沈阳和河南周口地区。上海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难以满足其需求。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组建城市信用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制定了几条原则,包括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监管者与经营者分离的原则,以及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当时全国多地出现

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组建城市信用社的现象,上海根据以上三条原则,经过讨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不能组建城市信用社。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执行监管者的职能,若自己参与经营,市场还有何公平可言?若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组建城市信用社,那么在银行与信用社业务有关联时,就容易侵犯国家利益而去维护小集体的利益。后来全国整顿城市信用社的事例,说明我们选择的做法是正确的。关于上海要组建多少城市信用社,当时负责城市信用社联社的同志来征询过,我们从上海实际出发,说“一百家也不算多”,最终建立了九十九家城市信用社。随着条件的成熟,在此基础上后来成立了上海银行。

此外,引进外资银行的工作也陆续展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已经有汇丰、渣打、东亚、华侨银行四家外资银行,但这还远远不够。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和口号,但作为一个开放城市,一座金融重镇,一定数量的金融机构是必要的。为此,我根据市委的部署多次前往北京,找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此事。后来终于决定上海再引进一批有实力的外资银行,这在外资银行中引起的反响是很热烈的。

就这样,上海通过一步一步的改革,终于为以后的银行体系建设勾画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二,重新建设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几乎是没有金融市场的。企业向市场直接融资,乃至企业间的商业信用,完全被取消了。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也完全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就信贷来说,有钱就存到银行里,缺钱就按计划从银行借;贷款的方式主要也只有定额内贷款和超定额贷款两大类。但是,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市场就是不可或缺